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

——如何做好全媒体时代突发事件舆论引导

□ 申展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将舆情治理置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在“人人皆媒”的全媒体时代，舆论场域既是凝聚共识的关键纽带，也是风险传导的“最快冲击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当前，各类突发事件往往呈现“线下处置”与“线上发酵”交织并行的新特征，舆论引导工作既要防范“茶杯里的风暴”演变为“现实中的飓风”，又要警惕“键盘上的火星”引发现实社会的“燃点”。面对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必须站在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以系统思维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将党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舆论引导效能。

把准政治方向，铸牢舆论引导的“定盘星”

新闻舆论工作从来不是单纯的业务活动，而是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治理行为。在众声喧哗的全媒体空间，突发事件的舆情应对已成为检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试金石”。

以政治定力校准价值坐标。越是信息纷繁复杂，越需要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清醒。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始终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信息发布、新闻报道、舆情调控等所有舆论活动都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这就要求我们在舆情研判处置中，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众说纷纭中拨开迷雾，在众口铍金中站稳脚跟。当突发事件裹挟着各种社会情绪奔涌而来时，既要避免“沉默的螺旋”消解主流声音，更要防止“塔西佗陷阱”侵蚀政府公信力，让党的主张始终成为最强音。

以人民情怀滋养舆论生态。舆情如水，宜疏不宜堵。突发事件中的每一个关切点，都是民情民意的“水位标尺”。要深悟“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注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既做信息的“发布者”，更当群众的“贴心人”，既要架设政策传达的“扩音器”，

更要开通民情上达的“直通车”，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更好析事明理、解疑释惑，让信息发布既有权威的力度，更有人文的温度，真正起到增进共识、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作用。

以斗争精神守牢舆论阵地。突发事件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让公众易产生“未知性”恐惧，谣言等负面舆情极易传播蔓延。面对可能出现的噪声杂音，要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敢于“亮剑”，在敏感热点问题上善于“拆弹”，在思想交锋领域精于“引导”，构建起激浊扬清、扶正祛邪的舆论引导态势。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将真相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展现，首发定调、赢得主动，最大限度传递党和政府声音，最大限度压缩负面信息传播空间。

提升治理效能，构建协同联动的“防护网”

舆论引导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媒体时代的舆情传播具有瞬时性和不可预测性，唯有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才能将混乱无序的舆论场转化为有序可控的治理空间，推动舆论引导从“应急处置”向“长效治理”跃升。

打造全周期管理闭环。建立从风险预判到处置评估的完整制度链条，形成“预警—响应—处置—反馈”的良性循环，实现“早、小、深、准”目标。早，即对风险动向的预测预判；小，即对苗头性问题的见微知著；深，即对海量数据的深挖细查；准，即对倾向性问题的精准处置。通过优化机制，实现舆论引导从“事后救火”向“事前防火”转变。还要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将舆论风险评估嵌入重大决策全过程，在政策制定时预判舆论“燃点”，在项目实施时评估舆情“沸点”，在改革推进时防控风险“爆点”，构建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安全屏障。

完善一体化协调机制。坚持舆论引导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加强统筹协调，打破部门壁垒，完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实际工作部门分工负责、新闻媒体积极参与、社会各方协调配合的舆论引导机制，实现信息共享“零时差”、资源调度“一盘棋”，

指挥处置“一张网”，确保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快速反应、各司其职、有机衔接。注重把“应对舆情”和“解决事情”结合起来，建立网上网下联动工作机制，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治理，既在“云端”构筑信息防火墙，又在“地面”夯实矛盾化解基座，从源头解决问题，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

建立全链条发布制度。信息透明是最好的引导。新闻发布制度的专业化与常态化，是确保信息准确性权威性的关键。通过健全新闻发布制度体系，分级分类培养新闻发言人，提升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推动领导干部更多地参加新闻发布活动，带头接受媒体采访，做好“第一新闻发言人”。建立重大政策解读专家库和口径库，搭建“政策制定者+领域专家+传播专家”的联合发布矩阵。完善预案与考核机制，通过日常演练和考核评价，将舆论引导成效作为干部履责的重要指标，推动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创新方法手段，打造融合传播的“新引擎”

全媒体时代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既是与时间赛跑的“信息攻坚战”，也是检验治理能力的“民心大考”。必须将对“时度效”的精准把控与创新传播技术深度融合，构建“权威发布定基调、融合传播扩声量、群众路线聚共识”的立体化引导格局，让主流声音既传得开、传得快，更传得准、传得深。

权威发布抢占舆论引导“制高点”。突发事件中的信息真空是谣言滋生的温床，通过“三种发布形式”与“三个时间节点”的“组合拳”，实现权威信息“快、准、稳”覆盖。把握好“三个时间节点”：在事发1小时内通过政务微信、微博等渠道发布首条动态信息，扼杀“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的造谣空间；8小时内通过主流媒体通报初步认定事实及处置措施，有效稳定社会情绪；24小时内视情召开新闻发布会，确保“发布层级与事件影响相匹配”。灵活运用“三种发布形式”，网络发布主打“短平快”，媒体发布侧重“深解读”，新闻发布会强化“权威定调”，有效提升信息发布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融合传播强化舆论引导“时度效”。“时度效”不是孤立指标，而是系统性工程，需要把握舆情生成演化规律，在“时”上做到分秒必争，在“度”上讲究进退有据，在“效”上追求入脑入心，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传播效果的有机统一。“时”的突破靠平台加持，打造“中央厨房”式全媒体发布平台，推动主流媒体与政务新媒体、社交平台深度联动，实现信息“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网分发”。“度”的把控靠内容创新，找准人们思想认识的共同点、情感交流的共鸣点，通过精准设置议题，将“党委政府想说的”转化为“群众要听的”。“效”的达成靠技术赋能，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政策解读、事件还原的沉浸式场景，依托算法模型实现信息的精准触达，让舆论引导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

共建共治筑牢舆情应对“防火墙”。舆论引导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技术问题，更是情感连接的政治艺术。需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将舆论引导延伸至基层一线，把“键对键的互动”转化为“心贴心的共情”。培育“百姓名嘴”“民间智囊”等基层网评力量，重庆山火救援中，摩托车队志愿者第一视角短视频频播放量超20亿次，让草根叙事成为正能量传播的“扩音器”。创新参与式治理模式，构建全民防控网，在浙江防汛抗台实践中，4.2万名网格员实时上报险情，群众通过“随手拍”功能贡献30%的预警信息，真正实现“人人都是瞭望哨”，推动了“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治理创新。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舆论引导工作既面临多重矛盾叠加的风险挑战，也迎来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机遇。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既保持“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战略定力，又增强“草摇叶响知鹿过”的见微知著能力，在理念创新中把握主动权，在制度变革中构建新优势，在技术赋能中打造强引擎，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筑坚固的舆论屏障。

（作者系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



人工智能对社会韧性的深度重塑

□ 李长源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度且广泛地重塑着社会的各个维度。从技术革新到组织架构的优化，再到运行机制的变革，其影响力无处不在。而创造性破坏宛如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标志，以惊人的速度与广度重塑着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它绝非简单的破坏力量，而是激发创新范式与推动系统重构的关键因素，它既颠覆了传统的社会模式，又催生出新的社会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亟须构建起适配的韧性机制，以此来应对变革浪潮中涌现的诸多挑战。

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深层次影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深刻改变社会，其影响远超技术层面，重塑了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与运行方式。一是在产业结构方面，人工智能的创造性破坏力量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以制造业为例，特斯拉“超级工厂”的全自动化生产线提升效率、降低人力依赖，宁德时代借助AI优化生产流程、减少产品缺陷，这不仅变革生产工具，更重塑产业链价值分配逻辑。二是就业市场受智能技术冲击，呈现岗位调整与职业升级并存态势。低技能岗位逐渐被自动化取代，然而与AI相关的新职业不断涌现，如“AI训练师”形成庞大从业群体。传统职业转型压力催生创新解决方案，像“数字技工”培养机制，以实践导向的能力提升路径实现职业生态动态升级。三是社会关系层面，人工智能重塑人际互动范式。元宇宙平台兴起使虚拟社交常态化，远程协作工具支持跨地域联动日常化。但过度依赖数字社交容易致现实人际关系疏离，出现社会关系“原子化”风险。部分城市通过社区干预策略，利用AI技术识别孤独人群并组织线下活动，这种“技术赋能+社会干预”模式为平衡数字与实体

关系提供新思路。四是治理方式也因AI技术发展技术化转型。我国“城市大脑”实时分析道路视频数据，优化交通信号灯配时，降低交通拥堵指数；智慧警务系统压缩重点区域警情响应时间。算法决策与行政权力形成新型耦合关系，但需警惕“算法黑箱”风险，部分地区探索算法透明性机制，要求公共领域AI系统决策逻辑报备，为全球治理提供参照。

人工智能推动下的社会韧性发展方案。在人工智能引发的结构性变革面前，社会系统正面临着经济、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多维挑战，而构建社会韧性已成为应对这些挑战的必然选择。一是构建全生命周期能力再生体系。经济韧性的关键在于建立“调整—补偿—升级”的闭环机制。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通过政企合作，为中老年工人提供技能转型支持，同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将终身学习机制嵌入就业体系。实践证明，经济韧性需要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力，大量传统行业从业者借此成功转型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力量。二是重构数字时代的社会联结网络。面对数字社交导致的人际疏离，我国部分城市通过社区干预策略，利用AI技术识别孤独人群并组织线下活动，有效缓解社会孤立问题。例如，一些社区推出的“AI养老助手”，既能监测老人健康数据，又能组织邻里互助活动，显著改善了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三是塑造人机共生的价值体系。AI对文化领域的冲击集中体现为价值认知的冲突。我国的敦煌研究院通过数字化平台将AI修复与用户创作相结合，吸引大量公众参与文物保护。这种“技术为体、文化为魂”的模式，为文化韧性建设提供了范本。四是完善技术治理体系。需加大对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监管力度，要求企业在数据收集、存储、传输等环节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同时，针对算法歧视问题，建立算法审计机制，对人工智能模型的决策过程和结果进行定期审查，确保其公平性和公正性。五是培育全民数字生存能力。应加强对公众的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教育，提高公众对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认知和防范意识，引导公众在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时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韧性构建的多维应对策略。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技术迭代与制度响应不匹配、算法权力与人文价值相冲突、生产效率与社会公平失衡等问题凸显，成为社会韧性建设的关键挑战。为应对这些复杂难题，需构建包含制度创新、伦理规制、协同治理、全球合作与韧性教育的全方位应对体系。

推动技术治理与制度创新。在制度创新层面，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对高风险领域严格监管，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深圳的算法备案制度为监管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应设立“监管—创新”平衡机制，允许在特定区域对自动驾驶、智能医疗等前沿应用先行先试，为创新应用提供发展空间。划定技术应用的人文边界。在伦理规制方面，技术发展必须坚守“科技向善”原则，将算法透明性、反歧视等伦理要求纳入刚性约束。比如，浙江省在智能客服系统中强制保留方言交互功能，为技术应用与文化传承结合提供了范例。此外，还需建立“伦理影响评估”体系，对重大人工智能项目在立项前进行全面的社會维度评估，以预防潜在风险。

端牢中国饭碗，良种是关键。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发挥‘南繁硅谷’等重大农业科研平台作用，加快攻克一批突破性品种”。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当前，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已进入第四个年头，通过种质资源保护、创新攻关、基地提升等一系列举措，现代种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良种覆盖率已超过96%。然而，面对全球种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态势，我国种业仍面临种质资源鉴定率低、育种平台衔接不畅、产业化进程缓慢等瓶颈问题，制约着种业振兴的步伐。为此，必须加快解决制约种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牢牢攥紧种业自主发展的基础关、核心关、终端关，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构建种质资源自主创新体系。种子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良种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源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外风险叠加等情况，做强民族种业、强化科技创新、做好种源自主可控至关重要。然而我国在种业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短板，如种质资源鉴定率低、全球市场份额低、核心育种技术突破性成果少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种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以甜菜为例，国产甜菜种子仅占市场1%，核心品种“遗传单粒种”99%依赖进口。且种业核心技术仍主要依赖于杂交选育和分子技术辅助选育等传统手段，对以“生物技术+信息化”为特征的高新技术掌握不足。为此，必须依靠科技力量，加速种业关键技术突破，推动我国种质资源实现存量优化、增量突破。一是构建精准化鉴定体系，建立国家、区域、企业三级标准化鉴定体系，搭建种质资源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形成种质资源收、储、鉴、用数据信息链条，提高分子标记、基因组测序等技术水平，提升优质种质资源鉴定效率。二是突破种业核心技术，加大对种业基础应用研究资金投入，围绕种业重大科学问题 and 关键“卡脖子”技术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挖掘克隆具有重大育种价值的关键基因，加大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三是提升种业国际竞争力，深入推进农业“走出去”战略，积极引进国外优异种质资源，增大种质资源收集与保护规模，提升种质资源库的国际竞争力，支持中国种业标准与国际种业标准对接，推动中国种业标准走向世界。

搭建种业发展重大科研平台。面对全球种业竞争加剧，仍需在技术融合、资源整合、国际合作等方面持续突破。“南繁硅谷”作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核心引擎，依托海南独特的热带气候和地理优势，南繁基地每年吸引全国29个省（区、市）的700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此开展育种研究。要发挥好“南繁硅谷”等重大平台作用，强化科研资源整合，构建协同创新网络。一是建立统一的科研资源共享平台，整合种质资源、科研设备和人才，实现种质资源、育种数据和科研成果的实时共享，提升科研协同创新能力，推动科研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二是协同突破核心技术，支持基因编辑、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智能育种等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动现代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融合创新，加快实现我国种业从传统育种向现代生物育种转型。三是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各类基地平台与国际种业组织、跨国种企的合作，引进国外优异种质资源和先进育种技术，打造全球种业枢纽。

做强各类种业经营主体。企业是种业创新的主体，其强弱直接决定了种业的兴衰成败。当前，全球种业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基因编辑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等新技术革命迅速推进，种业振兴的关键在于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研发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的种业企业。我国种业企业虽数量较多，但“小散弱”特点明显，研发投入普遍不足。2024年10月，第二十一届全国

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国种子双交会发布了我国农作物种业企业发展情况，数据显示，总资产在500万元以下的种业企业接近企业总数一半，44%左右的种业企业无研发投入。鉴于此，必须分类指导，精准培育一批优势企业，加快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一是加快培强育优高水平种业企业，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二是加强平台载体建设，创新科技人才使用机制、资源设施共享利用机制和科企合作机制，促进各类创新要素更多更灵活地向企业流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三是加大对种业企业科技项目和财政、信贷支持力度，着力推进种业企业与科研单位、金融机构、种业基地“三对接”，实现种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此外，支持育种企业开展数智化升级改造，加快研发智能育种算法与模型。

着力贯通产业推广应用链条。育种产业化是实现种业振兴的“最后一公里”，关乎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稳定和安全。当前，国际种业已发展为集科研、生产、加工、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体系。但我国“育繁推一体化”尚未成熟，种业产业化国际竞争力偏弱，科研机构公益性与种企市场化导向易导致育种研发成果与市场需求不匹配。面对这一现状，应以企业为主导，整合院校、企业等创新资源，推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品种创制—产业化开发”一体化，将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种业生产力。一是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育种新机制，推进种业产业链上下游紧密衔接，推动科研机构与种业企业的深度合作，加强对成果转化支持和引导，通过政策扶持、技术转移等方式，架起“实验室”与“田野地”之间的桥梁。二是深入推进科企合作，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通过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优化税收政策，以及完善创新要素流动机制和重点科技项目审批机制，扶持一批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种业龙头企业积极参与核心技术联合攻关。三是通过鼓励种业企业、科研机构 and 高校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促进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良好局面。未来，随着种业科技的不断突破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我国种业将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